

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HONGGUO WENXUE SHILUN CONGSHU

忏悔与越界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坂井洋史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坂井洋史 著

忏悔与越界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日]坂井洋史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

(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ISBN 978-7-309-07297-6

I. 忏… II. 坂…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4216 号

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日]坂井洋史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余璐瑶 赖英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310 千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297-6/I·550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章	“巴金”缺席的文学史	1
第一章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化批评 ——“现代论”和文学史研究的设想	15
	所谓“90 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文化批评中多样议 论的错综——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与 “90 年代”的“结束”——以“现代论”为中心轴的现代文学 史之构思	
第二章	忏悔与越界,或者“丧失”的机制 ——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尝试	81
	写在前面——〈天下/国家〉,或者现代的暗部——“丧失”与 “越界”的机制,或者文本的共鸣——五四时期白话诗中的 “丧失”,或者作为“观察者”的文学——忏悔与越界,或者现 代性的悖论——结语	
第三章	想象的中国文学 ——竹内好文学观念的走向	127
	写在前面——被“禁域化”的“文学”——围绕“个我”和“全 体”的思考:竹内好的“勉强”——关于竹内好对叶圣陶《倪 焕之》的评价——结语	
第四章	作为都市文化的大众音乐 ——大众音乐在当代中国的“解读”与现代性 理解的局限	158
	书写音乐的困难——摇滚乐解读的病征(1):摇滚乐是否“大 众音乐”? —— 摇滚乐解读的病征(2):崔健被如何解 读? ——结语: 作为〈制度/权力〉的“大众音乐” (第四章附论) 中国摇滚被如何“读”?	

	摇滚 = 可乐——歌词？还是乐曲？——人文关怀以外的摇滚	
第五章	“原野”与“耕作”	
	——从早期白话诗习作窥见“人文关怀”和	
	“模仿”的机制	193
	写在前面——关于陈范予的“诗稿”——作品(1):对于韵文	
	性的考虑——作品(2):短诗、长诗的尝试与王祺对诗稿的	
	修改——“原野”与“耕作”:涉及人生的“诗”	
第六章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语言意识及其现代性	
	认识的片面性	226
	“文学 = 人学”,或者文本的“透明化”——作为现代性之表	
	象的“现代文学”——叶圣陶的“敏锐”与“迟钝”——结语	
第七章	关于文学语言的“自然”与“第三代”诗语言中	
	“口语化”倾向	261
	文学语言的“自然”与“不自然”:从葛红兵的“论难”说	
	起——“第一代诗” = 政治抒情诗和“第二代诗” = 朦胧	
	诗——第三代诗的“抒情”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合法化与	
	解体——第三代诗人对“语言”的关注——结语	
尾 声	走向围绕文学语言所依据现代性的对话	301
参考文献		336
日文版后记		343
中文版后记		347

序章 “巴金”缺席的文学史^①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现代文学史”^②,而这些文学史的大部分是作为高等教育课程使用的教科书或辅导参考书而编成的。90年代前半以至后来的中国社会将80年代以前的“现代化”政策进一步加速,采用市场经济而实现了高度经济成长和大规模社会转型,而文学史文本也不能不受到如此巨大变化的影响。就是说,是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期待且需要能够适应“新”时代、“新”社会的“新”的文学教育以及作为其教材的“新”的文学史。不难想象,如此情况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陆续问世。回顾一下建国以后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史就可以知道以下情况:50年代初以高等教育体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适应为目标的所谓“院系调整”^③和现代文学史在高等教育课程中的编入^④要求具有水平的标准课本,结

① 本章以“第五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10日—13日于湖北省襄樊)的提交论文《关于话语的“排除”机制和文学史框架的重建》(载于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巴金研究》2000年第3、4期合刊。又收在陈思和、辜也平主编的《巴金·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33—42页)为基础,全面补充而成。

② 参看书末“参考文献”。

③ 指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等教育院校的重新编排和整顿,即大学、学院、系的合并、增设以及专业和课程的调整。同年9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调整基本告竣。又,同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制定高等教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为必修课程。

④ 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该会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主要课程。参看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自序》(《王瑶全集》第3卷所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30页)及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后收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22—47页)。

果王瑶编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①;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拨乱反正”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反映,唐弢、严家炎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册^②。如此想来,近年来文学史的重新编写,与这些“经典”现代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是一样的道理,以社会的巨大转型和与此相应的社会需求为背景。

这些“新”的文学史不无它们的“优势”。第一,“实证性”上的优势:《新文学史料》^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史料丛书”^④等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标志了这个时期研究的大步进展,尤其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依据。最近的文学史著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实证性研究成果的大量积累。第二,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突破”的继承:在80年代,诸如“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⑤、围绕“二十

① 上册于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上海)刊行,下册于1953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此后,于1982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修订重版本”。该书收在《王瑶全集》第3、4卷。这本划时代的现代文学史是为了对应当时教育体制改编之要求而撰写的,而关于此间的情况,王瑶自己在1954年寄与该书日译本的序文中有所透露。见《〈中国新文学史稿〉日译本序》(《王瑶全集》第3卷,32页)。

② 第1册于1979年6月、第2册于同年11月、第3册于1980年12月,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刊行。只有第3册,严家炎作为“主编”列名。该书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③ 创刊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6期)起改为季刊,至2007年底共出117期。

④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1978年5月由杭州大学和江苏师范学院发起,于1980年4月发表“丛书编辑委员会”名义的“序”。编著主要由于南方各地高等院校分担,由四川、山东、浙江、福建、湖北等地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史料丛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作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于198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并组织编辑委员会。编著的实际工作由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分担,出版社也不一定。两者都长期维持断续刊行,最终完成时期及其规模不详。

⑤ 主要在1986年,“政治革命史的历史分期到底能否机械适用在文学史的历史分期?”这个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议论,同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研讨会。参看樊骏:《关于讨论近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收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可参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所载两篇文章,亦箫:《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断代问题讨论综述》及李葆琰、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

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①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议论^②等等激活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性而带来新鲜的研究视角,现代文学研究就成为思考各种现实问题的切入口,而呈现了未曾有过的活泼局面。第三,对于“方法”的自觉意识:作为80年代开放政策的结果,国外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新”方法大量涌进来,掀起了一场“方法论热”,给过去相对封闭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带来莫大的刺激。

总而言之,近年来的文学史著作“后来居上”,它们继承80年代丰硕的“遗产”,以至拥有上述三方面的优势。因此,就描述的正确度、涉及面(作家和文本)的广阔和对对象选择、评价和判断的公允和灵活性而言,它们与“古典”现代文学史著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此我们就碰到一个原则上的问题:对于文学史文本而言,描述史实之际所谓“正确度”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应该如此说更为贴切些:文学家争先恐后地提出与先行的(也与并行的)文学史文本不同的多样描述之可能性(alternative),如此行为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思考资料和史实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时,我首先想到80年代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即“填补空白”。毋庸赘言,在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的大陆语境中,“填补空白”无疑是以“实证性”为武器批评压抑甚至扼杀研究“自由”的“政治的季节”而纠正曾经习见的史实之被恣意篡改或极端歪曲的有效策略。但是,就叙写文学史文本的原理层面而言,文学史家在理念上除非确实“预定”所有“空白”被“填补”完毕之后完美无缺的“整体”状态,那么,这个言说充其量也只能暗示文学史终究会被割裂成“正确”事实的无数片断之可能性而已。所以,如果文学史家一直拘泥于“填补”原则,他迟早会找不到尚待开拓的“边境”(frontier,即“新的空白”)而迷失研究目标,进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归结。原来,

① 指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的一系列共同讨论记录。他们最初联名论文题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上。之后,他们“对话”记录《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连载于《读书》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再加以讨论的反响作为附录,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书名出版(“现代文学述林”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

② 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时的总题目。从该刊1988年第4期开始,到1989年第6期为止,在这个总题下发表各种论文共40余篇。

80年代这个时代,如果把它解释为“后文革”时代,那么其主调当然是“失去的时间”的“挽回”,而文学史研究所标榜的“填补空白”也可以说是构成“挽回”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此对于“缺席的整体之片面化”此一悖论竟穿起实证性即科学性的“神话”的外衣而装扮“客观性”,一味追求片面领域即边界的扩张。显而易见,这种扩张性是现代性的表现。如此想来,“填补空白”说,在原理层面上,竟然与当时的“国是”即“现代化”的一种解释即西方语境的现代化共享思想基础^①。

80年代还有另一种类型文学史研究;它虽然企图将追求政治革命史框架和文学史框架之整合的文学史研究“传统”相对化,但是并不以实证性即科学性为其主要“武器”。譬如,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的围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议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参与“世界文学”的框架而可以获得“现代性”。在他们的观点中,“中国性”的相对化和“世界性”的获得是分不开的一体。他们采取的“策略”可说为巧妙的:随着“文革”的结束,将政治革命史框架对于文学史文本的支配和控制也一并赶到历史的后景去之际,为了淡化如此研究的动机和目标的政治尖锐性,竟将其合法性求诸欢迎与“世界”同步的朴素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之所以需要如此“策略”,因为在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一派和强调本土性的一派围绕“现代化”内涵的阐释权开展了一场斗争。且不管“斗争”的内容如何,仅注目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主要的一面即文学史叙述所依据的框架之建构及其霸权的确立,我们就看得出来他们最关心的依然是如何忠实地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自己采用的方法之“有效性”如何这个问题。但是,应该如何检验这个“有效性”?按道理,它只能以不断被发掘出来的“新”的事实和自己建构的“新”的框架之间的整合程度如何为其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是笃信“客观性”和作为“正确”

① 本书对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等概念词的用法基于以下原则:

(1) 西方语境中原创概念的〈modern/modernity/modernization〉不使用引号而使用〈现代/现代性/现代化〉。以下行文中,在一句话里面同时提示几个概念词,以表示and/or含义时,为使其中有关语感和理解的分歧更为明确,使用〈〉以括之,虽然如此用法不符合中文书写习惯(如〈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生产/普及/固定〉等)。

(2) 原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质变或误读而附加特殊涵义和语感时,使用引号括起来,如“现代”、“现代性”、“现代化”。

(3) 其他如“现代论”(arguments on modern)、“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等不加区别。

(4) 在日本语境中,modern往往译为“近代(kindai)”。鉴于“近代”在中国作为历史时代区分概念被使用的情况,除了可以推测的个别用例和注明的地方之外,一律不用。

事实之总和的“整体”之实在。就这一点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却与“填补空白”论意外地接近起来。因此,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为出发点而在80年代末出现的“重写文学史”的议论采取把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起来的姿态,也算是很自然的“发展”。

就其原理属性而言,文学史文本的特征如下:(想象的)整体的片断化、寻觅且贪婪收揽未知的片断而不断扩张自我、重视给这些片断的总和以有效的解释即重视效率性,等等。这些特征,其实是现代性的特征。如此看来,文学史原来是表象现代性的非常“现代”的文本。因此,我认为,近年来出现而且今后也会继续出现下去的“新”的文学史究竟到底能够“突破”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局面和体制与否,就取决于企图叙写文学史的作者究竟能够将不知不觉间规定且控制他的现代性本身对象化与否。然而,鉴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理解的片面性和偏向(本书各个章节的论考主要探讨这个问题),这个对象化似非易如反掌的事。

二

话虽如此,我并不是说,我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框架这个问题时,近年来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研究没有丝毫启发作用。譬如有一个事实:过去一段时期,个别作家研究方面的重点——巴金研究,似乎在那些“新”的文学史中没有受到他曾经在“古典”文学史著作中受到过的那样的重视,那几乎成为历史性存在。这个事实就让我去思考文学史文本所“排斥”的因素和文学史文本不得不带有的“排斥”机制等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部文学史文本竟“排斥”巴金而成立的话,那么这“排斥”到底意味着什么。原来,文学史需要涉及的覆盖面和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仅就被公认为应该涉及的“话题”而言,有个别作家、文本、文艺运动、文学社团,还有出版机构和媒体、市场和读者等。如果有一部文学史“排斥”这些话题中的某一部分(不止是一个)而成立,那么没有写进去的话题之“缺席”就会成为这部文学史的特征。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文本中的“缺席”才好呢?抱有“缺席”的文学史和“填补”这个缺席的文学史之间,到底有何差异?孰优孰劣?有无优劣的差别?

1989年11月,上海青浦召开了“首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一年是巴金晚年杰作《随想录》全5卷出齐后第3年,也是使巴金一跃登上文坛的成名作《灭亡》发表60周年。因此,与会者的关心似乎集中于巴金文学生涯的总结和文学史上的定位。我作的题为《现在怎样估价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略论文学史概念的变化并谈巴金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以下简称《略论》)的报告,一看这个冗长的题目就会明白,也是关于定位巴金的文学史框架的议论^①。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议论的肤浅是掩盖不了的。但是,不管如何肤浅,也是从较为明显的关心即如何将关于个别作家的专题研究之成果编入文学史文本中这种关心出发的议论,离现在的关心不怎么远。不用说,现在我将要提示的议论应该从“如何将巴金定位在文学史上?”、“定位巴金的文学史之框架应为如何?”之类提法变为“为何巴金从文学史‘叙述’给‘排斥’出来?”、“‘排斥/不需要’巴金的文学史叙述所依据的叙述原则究竟是什么?”如此提法,而且包括对于当时的自己并没有觉察到的问题之思考,重新被提出来。那么,现在的我,为何能够发现以前觉察不到的问题?当然,我不敢说自己的思考成熟了,但我的确从反映90年代后中国的现实,尤其是充分反映并思考8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为了阐释眼花缭乱的现实而运用之种种方法所凸现出来一系列“问题”的文学史著作和研究得到启发。所以,我倒认为,在此拿出压在笈底的旧作,从现在的眼光重新检点其中一些论点,也具有超过我个人的回顾或怀旧以上的某种意义。

我在《略论》中设定两个概念:一为“内在研究”,另一为“外在研究”。我用这个概念,将文学史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尽量贴近研究对象固有的逻辑,忠实地追究且理解作家的行为或文本成立过程的必然性,这是研究的“内在化”。与此构成鲜明对比,依据研究对象外面先验存在着的逻辑,从“外部”的“标准”裁断对象,这是研究的“外在化”。站在前者立场的研究要求捉住对象逻辑之际切入口的多样和丰富,因此它特别重视资料。实证性就是内在研究的生命线。按照我今天的理解,这种研究的思想基础是现代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无限地分割成无数的片断,而想象

^① 载于福建泉州黎明大学编辑出版的《巴金文学研究资料》1990年第1期(1990年4月)。

无数片断的总和就是“整体”(实际上,这“整体”是只能想象的理念而已)。而对于站在后者立场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研究对象和既定在外部的逻辑或标准之间的“距离”如何。两者的接近意味着“肯定”,背离意味着“否定”。照如此理解,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评价标准的党同伐异式“研究”(如果这也可称为“研究”的话)是最典型的“外在研究”。因为巴金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永远的仇敌即无政府主义,所以曾在某一段时期受过严厉批评,而其文学上所有行为的价值都被贬低,这是很好地说明这种“研究”本质的例子。

照今天常识性理解来看,在文学研究当中,“外在研究”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应该尽量回避的研究态度。但是,我却在《略论》中提倡文学史研究要实现“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的有机结合。因为我认为,尽管研究者执拗地追究属于某一个作家个人的逻辑而尽可能给它以圆满的整合,也只能算是一部“作家史”的完成;无数的“作家史”的集合并不等同于有头有尾的“文学史”。我还认为,既然单纯地合算事实的“片断”也不能凸现出支持文学史文本的一条“脉络”来,那么文学史研究到底需要与研究对象的“片断化”完全相反的某种“综合”。换句话说,史实的堆积不是“史”,经过“脉络”所要求之取舍选择之后,史实才能成为“史”的有机因素。当然,对于“作家史”或作家个人具有的内在逻辑来说,如此“脉络”毕竟是“外在”的因素。因此,我在《略论》中,作为暂时的结论(当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结论”而已)提倡:在文学史文本这个“场所”上,承认“脉络”如此外在因素的同时,应该将“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适当地结合起来。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始终要保持关于“脉络”的设定和建构文学史“整体”的志向,也要防止过度倾向于外在的“脉络”而粗暴地裁断(贬低甚至否定)研究对象固有的逻辑或对于本来很丰富的现实世界施加简单化的理解;为了避免如此弊端,“内在研究”是最有效的具体方法。那么,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能够叙写出什么样的文学史文本来?至于其具体的“文学史像”,虽然现在的我并没有明确的设想,但是我至今依然相信,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原则,对于“内在研究”的执著是防止研究的僵化和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的图解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略论》提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文本”概念及其属性的解读之多样

性。当时(以至今天)我认为,“文本”是各种解读为了争夺阐释的霸权而开展激烈斗争的公开“场所”(topos);在这个“场所”上,连作者的主观意图也被看作诸多解读中的一种而被彻底相对化。如果读者不去切断文学作品与现实的作者之间所有层次的联系,那么他尽管进行彻底的“内在研究”,也终于不能不把最后一个“片断”(即他不断施行“片断化”的结果)封锁在从外面不能窥见底细的“暗盒”(black box,即“作家的内心世界”)里面,而把作品视作不可知的神秘存在。但是,读者一旦把作品视作由于多样解读织成的“织物”(texture),那时在他的眼里,作品已不是作家思想和阅历的痕迹,也不是时代和社会等“现实”的反映;也就是说,读者依据如此“文本”观念,可以把自己的解读往多元化的方向解放。我还说过,如果把这些多元的解读“综合”起来,那么作为多元解读之总和的“整体”就会呈现与以往文学史所标榜“整体”不同的景观。原来,在80年代末的中国学术界,连text的翻译词也没有定于一词,所以我也不怕自己思考的不成熟而敢提出如此“启蒙”性的见解,回想起来,实在不胜惭愧。但是,现在我认为,文本分析却可以说是现代性对于文学研究的反映即功能性片断化的典型方法。如此研究方法就相当于文学史研究中的“内在研究”,不能不背负起“脉络”的缺席和“空白”的永远开拓这个命运。果然如此的话,我们面临如何记述文学史文本此一具体且现实的问题时,尽管执著于文本分析,也不能立刻获得直接且有效的对策。就是说,对于文本的执著和文学史文本的叙写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如此想来,上述“提议”,虽然作为一般性建议还不失为妥当,但是究竟是令人惭愧的多余行为。

话题回到巴金上。巴金直到30年代经常说起“文学无力”,把埋头从事创作的状态认作违背夙愿的状态,但是他终于没有放弃手里的笔,没有停止过其写作活动;违背夙愿地生产文本的现实处境和热烈希求干预现实的内心追求之间,巴金一直处于某种分裂状态。巴金自己把这种状态叫做“矛盾”。我在《略论》中,竟然把这个“矛盾”解释为作家对于以文本为媒介的信息传达之界限以及文本中自己主观被相对化作用的意识之反映,由此贸然抽出巴金文学的“先端性”。其实,把巴金的“文学无力”观念或“矛盾”与20世纪发生的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或文本解读的多样

性混为一谈,简直是牵强附会。第一,我们难以相信,包括巴金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一代早在二三十年代就能够充分意识到今天水平的文本理论而把它反映在自己的文本生产上面。不待言,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当年的巴金屡次表明的“文学无力”,换句话说,是“语言表现对于现实变革的无力”。这种把“语言”与“行为”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实际上基于对语言和话语之本质的过度简单化,而我们解释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所有文本的生产机制时,几乎是无效的。当然,当时巴金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苦恼无疑是真挚的。尽管他当时的感觉是某种“错觉”,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不对研究对象内在的逻辑进行相对化,那么定位这个对象的文学史文本的问题也无从考察。如此想来,当时的我,虽然提倡什么“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的有机结合,其实无条件地偏向于巴金内在逻辑的一方,把他的逻辑无限制膨胀起来,以这个逻辑为主体而勉强把它与“作品”变为“文本”的文学观念转型即“外在”的逻辑衔接起来,这是《略论》最大的缺点。这不外是逻辑上的矛盾甚至是破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至今天,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如上所述,其内涵有所变更),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化、多元化。在话语空间,表象如此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各种各样“声音”主张自己的存在理由而角逐。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就其基本趋势来说,走向大众化方向。照先一步实现大众化社会的国家、地区的经验来看,在大众化社会中,过去独占话语霸权的精英知识分子被迫从话语空间的中心退到边缘地带。由于话语霸权的独占而〈生产/主宰〉社会价值观念的精英,面临如此社会转型,不能不重建自我的身份(identity)。对于过去的精英来说,针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性言论就是他们身份的表象;在今天的走向大众化的社会中,他们慷慨激昂的叱咤之声很容易淹没在多种多样的“声音”中。他们不是昔日的他们,已非振臂一呼大众云集的“英雄”。经过如此变化,精英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话语的〈生产/普及/固定〉是以他者“声音”的边缘化为前提的知识结构中等级制(hierarchie)的渗透和确立,甚至是“权力”的暴力性行使。就是说,站在自己“语言”的对立面的,并不是什么“行为”之类,而依然是“语言”。这个事实,在社会的急速且巨大的转

型中,愈加明显起来了。

至此,我们好容易才到达文本中“排斥”机制这个问题。一言以蔽之,“排斥”是话语所依据权力的暴力性行使之谓。原来,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排他性质。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政治/文学〉模式。它以为,以非功利性和自律性为生命的“文学”往往被极为现实的、功利性的“政治”之实用主义(pragmatism)歪曲、压抑甚至扼杀。这个观念把“文学”和“政治”看作势不两立的主要矛盾的对立面。其实,以文学的“自律性”为根据而批评政治的暴力性只不过是针对强者对于弱者之压抑的道德性批评而已。暂且不问现实“排斥”必然带有的道德问题,原来“文学”和“政治”是互相排斥对方而把自己规定为自己对立面的对立面,因此就“排斥”即权力的行使而言,两者是相对等价的。“文学是弱者”的话语往往被“政治=权力=暴力”如此对于政治简单化的理解支持着,而不会去考虑〈文学的政治性/政治的精神因素〉等问题。虚构自律性或非功利性等“本质”而排斥“政治”的“文学”,难道一点也不行使话语权力的“暴力”吗?

就巴金而言,他一直对自己的“矛盾”投射真挚的眼光,最后确立“批判者”的“态度”,终于把自己从“文学无力”观念的泥沼救拔出来^①。我在《略论》中认为,巴金通过“态度”的确立而从〈语言/行为〉式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的束缚自拔出来,如此“回心”是继承或再生传统文人意识的反映。就是说,我主张要把巴金定位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的〈断裂/继承/变形〉如此框架里面而下一个合乎实际的评价。这是极为“古典”的,不,应该说是极为陈腐的结论。虽说陈腐,但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而研究巴金的文艺思想,在有限的“巴金研究”领域中依然算是比较新鲜的方法(是一个“空白”),不无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个框架本身究竟是“古典”的。虽然我提倡以文学观念的转变为前提的新文学史框架的建构,但是只能再确认“古典”文学史框架的有效。在这个意义

① 如此见解,我在几乎与《略论》同时期发表的《读巴金——“违背夙愿的批判者”的六〇年》中提示过。该文本系日文,最初发表在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季刊)第16号(1989年9月)上,后收在山口守、坂井洋史合著的《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因为后者经过较大的修订,所以该文的“定本”应为中文版。

上,《略论》的逻辑彻底破产了。关于巴金的苦恼所体现的“古典”命题,本该在其“古典性”的范围内寻找圆满解释才对,但是我却勉强把它与当代关心(先端的20世纪文学观念)联结起来,以至给论述的逻辑带来破绽。果然如此的话,我也许不知不觉间摸索到了今天的文学史研究之所以“排斥”巴金的主要原因。实际上,1989年以后,我也没有进行过关于巴金的“内在研究”,袒护“排斥巴金”。

三

旧论的自我评价不觉太长了。的确,80年代末的我没有觉察到,把所有作家的内在逻辑按照自己的逻辑标准而“排斥”,使所有的“主观”隶属于历史客观规律的“僵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只不过是与“作为事实(及其总和)的历史”构成明显的对比的“被叙述出来的历史”之极限形态而已;我更没有觉察到,“排斥”的机制在话语空间的所有角落布下罗网,连文学史文本也无法逃出这个罗网。“僵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是露骨地应用“排斥”机制恣意性的例子,所以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其话语性。但是,支配话语空间和一代知识结构的“排斥”机制却极其巧妙地以“科学性”或“客观性”等神话“装饰”已经“排斥”完毕之后的话语而把它作为“常识”〈散布/固定〉下来,我们也往往看不出其中被行使的权力之存在。因此,我们要求脱离如此被动状态时,严厉的相对化思维即解构思维可以成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作为这种思想,如后殖民主义思想,它是从边缘地带对于西欧中心主义在第三世界的话语空间和知识结构中行使的“排斥”机制之暴力性进行批判;又如女权主义批评,它直接暴露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立后有关〈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所有话语是以“排斥”女性所具有的身体差异性而被〈想象/虚构〉出来的等质性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愈来愈敏锐地〈觉察/认识〉到话语为要确立自身的霸权而行使的“暴力”之存在。我认为,剔抉出作为“排斥”的结果而被遮蔽的诸多因素来,而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文化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目标。

但是,我们一旦站在能够把全部“事实”相对化的制高点,那么有关文本解读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吗?在此不妨举具体的例子。据我的印象,近年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萧红《生死场》施行新鲜解读的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①确是富有刺激和启发的研究之一。它剔抉了被现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即民族国家话语所依据的男性霸权给排斥或遮蔽的萧红文本之独特性。刘禾指出,过去大部分批评家硬要把萧红的文本装在“民族救亡”的语境里面而解读,但是他们没有觉察到所谓“民族救亡”是在女性身体性的消灭和“等质”的民族主体即“抵抗者”的虚构等前提下成立的话语,所以没能解读出萧红文本独特性的所在,结果陷入严重的误读。我认为,刘禾非常巧妙地把现代文学文本甚至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一直被〈排斥/遮蔽〉过来的重要因素剔抉出来。因为她指出织成文本的诸多因素而解开它们时显示出极为“巧妙”的手腕,所以她的解读具备颠覆从前读者习以为常之“常识”的冲击力。但是,这个冲击力主要来自她从作为“织物”而现存的“整体”中“捞”起陌生的片断时显示的手腕之巧妙。在此我们还要质问:被遮蔽的因素全部被“捞”出来而把它们放在视野的中心位置时,到底什么样的“整体”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认为,刘禾关于这一点似乎依然缺乏明确的认识,至少没有提出明确的答案。读了此文后,我感到些微不满,是因为刘禾的议论也终究未能避免如上所述把研究对象割裂成无数片断的那种研究方法,甚至〈解构/相对主义〉不得不陷入的困境。

刘禾的萧红解读中似乎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据她的观点来看,以往的萧红解读都是〈排斥/遮蔽〉其他话语而确立霸权的主流话语之构成因素。但是,仅就萧红的独特性之评价而言,她的解读并没有大大地超过以往的解读,没有超过极其朴素的印象批评之水平。在过去,大家也不是一致认为萧红是富有天赋的、具有敏锐感觉和细腻笔致的屈指可数的好作

^① 原载《今天》1992年第1期。后收在《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三联文库·海外学术系列”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0月)。